

《创业史》《山乡巨变》的经验值得参照

□杨辉

讨论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理念、路径和方法，《创业史》《山乡巨变》的经验仍然值得参照。这两部作品所要回应的具体现实问题、阐发的观念、塑造的典型人物、艺术表现风格不尽相同，却共同呈现了1950年代时代的宏观面向。它们之于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启示意义有三：从时代精神总体性意义上回应具体的现实问题；细致书写具有新时代新观念、新心理的“新人”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的自我创造及其现实意义；坚守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也吸纳新经验，在促进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拓展现实主义的表现力。与柳青、周立波力图在时代精神总体性意义上回应具体的现实问题、书写宏阔的时代之变一样，新时代作家也在同样的意义上，力图感应和表达新时期的现实新变。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经验，是这些作品能够切近和表征时代重要议题的原因之一。新生活与新人交互影响、互相创造，在创造新时代新生活的过程中，新人完成了其极具现实意义的自我创造。从《创业史》《山乡巨变》到《雪山大地》《星空与半棵树》《宝水》，从1950年代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乡村生活已然发生了极具历史和现实意味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梁生宝、盛淑君们期待“未竟”的生活创造，在才让、安北斗等人的生活中得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后所打开的境界，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虚拟风景的展开，亦呈现为具体的“人事”风景的全新创造。而在生态文明观的指导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所敞开的“山乡巨变”，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充分体现，包含着超克西方现代自然观弊端的重要价值和实践意涵。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乡土叙事”的时代价值

□曾攀

“新乡土叙事”是近年来学界讨论较为热烈的命题，因其直接对应着当代中国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山乡巨变，成为这一时代重要的文化和精神样本。“新乡土”不仅指新生活现场与新民风民俗，而且对应着乡村和农民的观念重塑、精神重构与文化重思，并由此衍生出新人物、新观念，形成乡土新变的内生性动力，衍化为自足性、发展性、建设性的乡土气象。“新乡土”的形成，离不开“主体”的“实践”参与。在这个过程中，熔铸出“新人”主体，激荡起历史的洪流。“新乡土叙事”之“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时代性，依循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形成的宏大旨归，于传统的历史积淀中，不断建构新的历史意志和变革精神，秉持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实事求是，在广阔的农村生活天地中，探寻文学书写的“沉重的时刻”；二是主体性，作为乡土写作甚至乡村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关涉此间之世界的全新形象塑造；三是实践性，与中国当下的山乡巨变息息相关，写作者或见证或实践，融直接与间接经验为一体，获致切己的经验并辨析主客体的价值属性；四是发展性，承续百年来中国文学与文化求“进化”、求“变革”的理路，革故鼎新，在当代中国乡土的新发展理念与发展格局中，重塑叙事的观念与观点，更新主体形象的经验与意志、观念与价值，在更广阔的维度中捕捉“发展”的当代意义。好的“新乡土叙事”，将成为当下中国现实的症候与表征，透露出整个乡土文化传统的当代更新，代表了“发展”中的时代镜像，蕴蓄着极为强烈的可建设性与可变革性，期许能够创造新的天地，创生新的可能和新的未来，建构新时代乡土世界的人物谱系，尤其是“新人”的塑造与再造。

(作者系《南方文坛》副主编)

在相互的能动交流中充实彼此

□李哲

当下农村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变化，“流动”成为对其进行表述的关键概念。这种流动性的出现提醒我们，“农村”作为一个有边界的空间不再天然地存在。带着这种感知回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也会发现“山乡”和“巨变”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周立波笔下“巨变”的“山乡”自然也有流动，但这种流动是有明确边界的。在《山乡巨变》的开头，土地庙被人乡干部邓秀梅视为一个“边界”。周立波所写的这个边界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它同时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民俗等意义上的边界，代表是一种“人乡问俗、人问国政”的传统。在这个边界上，“外来者”的身份会被标识出来。在我看来，这个认识的“边界”意识，是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带来的经验，是对中国传统的接续和重新激活。周立波和他笔下的邓秀梅身上体现的，就是这种态度、这种品质。流动可能会冲击乃至消解实践意义上的边界，但会更清晰地标识出我们“认知”的边界。这里的挑战在于，我们对农村的认识，很容易被纳入既有的自我意识。或者说，农村不再是一个有待认知、有待链接的他者，而是成为我们既有的情感结构、知识结构的其中一个承载物，成为这种情感结构、知识结构进一步固化的催化物。意识到“未知”的存在，然后让自己带着某种既定前提的认识和实践暂时停一停，让乡村以一种能动的方式进入我们，丰富我们，在相互的能动交流中丰富对方、充实彼此。在这一点上，周立波和他那一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仍然有重新理解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乡土中国自然面向的两副面孔

□邓小燕

多年来，我断断续续做了些乡村漫游式的田野实践，累积了一点乡土志，不过我关注的是农民和自然合作的领域，试着通过交流和观察，理解乡下人在与山石草木的合作中养成的自然品格。乡土文学有两副自然面孔：一种是理性化的，一种姑且称为灵性。早前我讨论过的梁鸿和乔叶，她们的写作差异虽大，但乡土世界都是偏于理性化的。梁鸿触摸满河的伤口是典型的环境叙事，可以归入愤怒的田园诗传统，背后是生态学理性。《宝水》则属于乡土风物书写，最典型的便是挖野菜，这样一种古老的救荒实践在当下看似很土气，实则很时髦，属于都市博物实践，这些自然风物具有地方属性，是由作家补习的植物学予以理性化的。乡土文学的自然书写，还有一条非理性的、强调灵性的传统，如沈从文、萧红、迟子建、刘亮程和李娟等人，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边地作家。以萧红为例，她在社会层面驱逐了“跳大神”，但在面对自然时俨然是一位通灵的萨满，能与花园中的果蔬、屋顶的蘑菇以及冰雪大地沟通。批评家认为，这是儿童视角，但儿童视角本身就是万物有灵的视角。萧红对萨满的自然改造延续到迟子建、胡冬林等东北作家身上，体现出乡土文学自然灵性的一面。当下无论是环境叙事还是都市博物学，都颇为流行，也都在参与塑造乡土文学的理性品格，我个人同时也是自然主义者和博物爱好者，但面对它们对乡土文学可能的影响，我的态度还是有些犹疑。自然不能简单地视为农民的物质本钱，更不用说当成风景了，或者只是科普的对象。乡土自然中蕴藏着我们这个从农业中成长起来的民族的天然元气，显著区别于梭罗的自然传统，值得深入辨析。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师)

中国作家协会召开“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

(上接第1版)三是要立足时代，认识新时代农村的新变化，书写新时代新农民的新生活。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改变，这是新时代文学在书写农村题材时面对的全新的、也是根本性的时代语境。作家的写作要跟上这种变化，写出新时代之“新”、新农村之“新”、新农民和新生活之“新”。要全面了解农村状况与农村生活，努力塑造新农村形象与新农民形象，不断地打磨艺术、革新技术，让对新内容新形象的表达与对新技法新风格的探索相互催生、有机结合。四是要主动投身农村现代化实践，探索文学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新途径，彰显新时代文学的历史主动性。作家要真正写好新时代的农村和农民，不能只在“纸面”上下功夫，还必须走到“地面”上来，要真正深入人民生活，参与历史实践。中国作协将推出一系列工作举措，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推动文学更加有效地助力乡村振兴。要抓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抓好“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重点作品扶持等工作机制，加强选题策划、创作扶持和理论研讨，激励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出成绩、出精品。要不断健全公共文学服务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清溪村文化建设工程，进一步增强文学参与社会实践、服务人民生活的意识与能力。

间和读者检验的文学行动，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邱华栋介绍了湖南益阳清溪村“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村庄建设情况。他表示，要持续加强对作家队伍的团结引领工作，创新活动形式，扩大工作覆盖，提升服务水平，积极开展面向社会、面向基层的文学公共服务。下一步将紧紧围绕把清溪村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文化振兴的高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样板、共同富裕的典型这三个目标，以文学助力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典范。

会上，各领域专家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和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经济学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武力梳理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有关农村问题的重要论述，认为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在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仍然处于急剧的转型期，亟须文学创作拿出好作品，提振中华民族的信心、自豪感。

反贫困专家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琦回顾了中国减贫的历程和成效，总结了“中国减贫的经验与启示，认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看来，今天的我们要从历史中传承优秀的文学创作理念和艺术实践，要以诚与真的方式去理解与书写真实的乡村中国。我们时代的乡土写作要写出新农村的重大变革，更要写出新农村人的精神生活，寻找与这种新生活相匹配的新形式、新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认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与山乡巨变，正是在发展变动着的生活、正在进行时的现实。写好山乡巨变中的人，就要吸收老一辈作家的创作经验，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必修课，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库存，提升阅读生活的能力。

北京作协副主席乔叶结合自身创作长篇小说《宝水》的感受，分享了对乡土文学的传承与创新、乡村变革中女性意识和女性命运的发展变化等问题的思考。她表示，乡村、农村、村庄、时代，这些词语都蕴藏着文学的富矿，其中最具有核心价值的矿脉永远是人。

河北作协主席关仁山结合多年来农村题材的写作经验，阐述了作家应如何艺术地展现农村新貌、塑造农村新人形象。他表示，作家应该积极融入新的生活，以新思想和新感情讲好新故事，塑造新人典型形象，真实记录、艺术表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这是作家的责任，更是作家的光荣。

(上接第1版)《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认为，作家要深入“三农”一线，“按照农村的本来面貌写”，才有可能写出客观真实的农村。

《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主编王国庆谈到，从根处洞悉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考察其形与神、表与里、一隅和全局的关系，思考“城乡交叉地带”在新的语境下呈现出哪些新变、又面临哪些问题，这些都是时代赋予作家的课题。作家要全身心投向农村生活现场，以艺术的方式、审美的姿态去讲述和阐释，以文学的初心呈现生活，展现乡村生活的温暖底色。

把握“新质”农村，书写广阔历史变革

随着科技兴农的深入发展，乡村在“互联网+”、文旅融合、农旅融合等方面正展现广阔的历史变革。乡村成为开放、流动、参差多态的时空载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看来，新时代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应当更多关注有不同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生活习俗的乡村，书写具体的个性化发展之路，应该将新农民形象作为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兼业、农业与人文相融合的时代主体来塑造，展现新农村中伦理道德、情感结构与感受方式的微妙变化，书写个体命运在社会律动与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图谱。

乡村不仅负载国家粮食安全、国计民生、生态建设等物质性内容，更承载历史、人文、乡愁等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认为，作家应当深思农村的来路和去向，思考广大乡村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中应当发挥的历史性作用、能够提供的强大的资源和精神支撑，“只有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把握‘新质’农村、‘新质’农人，才能写出具有宽度、广度、厚度、深度和力度的文学经典”。

乡村精神文化构建也是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新山乡巨变》作者余艳结合湖南益阳清溪村乡风文明的改善情况谈到，作家应当思考如何创造出农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从中得到文化熏陶、精神滋养，继而引导农民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真正实现新时代乡村“农人的现代化”。

如何书写当下中国乡村所蕴含着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可能性?《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李云雷认为，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要有历史视野和未来观照，将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来整体把握。作家要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切身的体验，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经验，书写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

李敬泽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主题和议题的系统思考、深入探讨，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敏锐发现、生动书写乡村世界的新发展新变化，不断推动文学创作在观念、形式及内容上的革新，推出一批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精品力作，深刻、广泛表现发生在新时代农村大地上的“山乡巨变”，并在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参与乡村振兴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实现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吴义勤介绍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开展情况以及近期工作设想和安排。他表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持续性系统性工程，要深刻领会其重大意义，开拓思路深抓选题，协同发力深化研究，多措并举狠抓宣传，持续推动“名刊名社拓展计划”等一系列相关工作机制不断走实走远，把“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持续打造成经得起时

社会学和农业问题专家代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陆继霞表示，通过文学作品反映中国乡村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变迁、叙述贫困人口“翻身”的故事，讲述乡村振兴、城镇化、共同富裕的地方经验，讲述各个领域在乡村所发生的巨变，是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对文学作品的必然要求。

陈彦谈到，文学需要记录好我们共有的乡土。如何吸收前辈、包括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学成果，多角度、全方位地记录下我们在场的这个时代语境已全然不同的新的“创业史”与“山乡巨变”，尤其是聚焦有关人本、尊严、权利、公平、发展、共享等话题，从而抵达“乡场上”那些情感精神生命的最深处，当是我们不可缺位的工作。

当天下午举行了会议研讨。李敬泽、邓凯、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鲍坚，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等出席。研讨环节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向阳主持。“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者代表及2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继续围绕会议主题和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交流讨论。大家表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作为新时代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秉承中国乡土文学优良传统，立足当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实践，用心用情用力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座谈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作家出版社承办。

“我们当然期待好作家能够自发地找到好的选题。但在信息冗杂的时代，对于好的选题，作家未必都能自己看见。因此，文学出版要加大选题策划力度，积极主动发掘生动典型的素材。”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鲍坚结合“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来稿情况谈到，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题材、风格和视野单一、文学性不足等问题，作家出版社将针对性提升来稿的数量和质量，扩大视野、加强策划，积极发掘青年作家、新作家和基层作家，丰富选题类型，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迈上新台阶。

“在城市文学日益崛起的大背景下，对农村有了解并且有兴趣的年轻作家越来越少。如何发现他们，如何将他们送下去、待得住、写得出，这是文学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谈到，需要深入了解“三农”的知名作家持续创作，更需要一大批能够书写新时代的农村、承担新时代文学使命、创造文学新样貌的“新人”作家。作家、编辑、评论家和读者的共同参与，将会为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建构更加良性的文学生态。

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开辟文学的广阔天地

(上接第1版)

我们要努力塑造新农村形象与新农民形象。新时代文学应当塑造出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典型乡村形象。回望历史，从鲁迅的“未庄”与“鲁镇”、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到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桑干河畔”、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清溪村”、柳青的“蛤蟆滩”和路遥的“双水村”，我们在文学作品里曾与许多著名的村庄相遇，正是作家们创造出来的这一个一个村庄地标，参与塑造了人们对中国乡村的基本印象和整体想象。新时代的中国乡村，应当为这一谱系增加属于自己的地标，让新型村庄的鲜明形象，成为展示新时代中国的文学名片。创造新的、吸引人的村庄形象，关键是要塑造出生活其间的、彰显新时代精神的典型农民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文学写作的“人”，是充分精神化、价值化的，他的形象中凝聚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活跃的现实命题，因而能够成为时代和历史的个性表征。我们的创作，要有能力对现实的理解和对历史的洞察，有力地浓缩呈现在农民“新人”的故事与形象中，用新时代农民的生动表情和响亮声音，描绘出新时代农村的精神图谱。

观察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方法，塑造新的形象需要新的形式。生活与人的新质，必然有新的艺术表达与之相适应，而不能以自我重复进行无效的述说。新时代的农村生活与农民形象，是复杂的、多维度的，而且是仍在不断生成中的“经验综合体”，陈旧的文学表现方式，已很难追上现实变化的速度，

也难以容纳海量膨胀的复杂信息。为此，我们应当不断地打磨艺术、革新技术，让对新内容新形象的表达，与对新技法新风格的探索，相互催生、有机结合，不仅是“写新的”，而且要“写得新”。这是来自文学发展规律内部的深刻要求，值得每一位书写新时代乡村的作者深入思考、不懈探索。

第四，我们要主动投身农村现代化实践，探索文学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新途径，彰显新时代文学的历史主动性。

文学创作的成果，体现为一篇篇作品、一本书。然而，文学创作的过程，远远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这么简单。作家要真正写好新时代的农村与农民，不能只在“纸面”上下功夫，还必须走到“地面”上来，要真正深入人民生活、参与历史实践。在这一点上，前辈作家们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柳青也好，周立波也好，他们之所以能用虚构的叙事记录下真实宽阔的人民生活状态和乡村变迁细节，至为重要的经验就在于，他们不是走马观花的造访者、观光者，而是亲身在场的实践者。柳青之于皇甫村、周立波之于清溪村，都不是以作家身份去“采风”的，而是真正投入到乡村基层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具体过程里面，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变化的历史实践。他们不是在“看”，而是在“做”。正是在行动中，作家获得了新的实践主体性，打通了文学与广阔生活原野之间的对接道路。在行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这样的经验，对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启发意义。

不仅是文学创作，对于文学工作来说，获得新的实践主体性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作协对清溪村“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村庄的打造初见成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

个重要感受就是，文学不仅仅是一项精神性的事业，它同样也可以在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获得极为具体的现实能动性与历史主动性。文学对乡村振兴的助力可以是间接的，也可以是直接的；对“国之大事”的担当可以是宏观的、深远的，也可以是具体、很精确的。接下来，中国作协将推出一系列工作举措，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推动文学更加有效地助力乡村振兴。我们要做好“向内”的工作，切实抓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抓好“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重点作品扶持等工作，充分发挥中国作协所属报刊社网的出版平台优势、理论研究优势，加强选题策划、创作扶持和理论研讨，激励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出成绩、出精品。同时，我们还要做好“向外”的工作，持续帮扶清溪村作家书屋群落建设，系统性加强宣传力度，组织筹办丰富多彩的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学活动，不断健全公共文学服务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清溪村文化建设工程，进一步增强文学参与社会实践、服务人民生活的意识与能力。

新时代农村的发展变化，背后是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变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昭示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光明未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我们相信，新时代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一定能感知时代新变、投入时代洪流、书写时代景观、诠释时代精神，用更多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精品力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文学力量!

建构良性文学生态，引导推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

“我们当然期待好作家能够自发地找到好的选题。但在信息冗杂的时代，对于好的选题，作家未必都能自己看见。因此，文学出版要加大选题策划力度，积极主动发掘生动典型的素材。”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鲍坚结合“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来稿情况谈到，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题材、风格和视野单一、文学性不足等问题，作家出版社将针对性提升来稿的数量和质量，扩大视野、加强策划，积极发掘青年作家、新作家和基层作家，丰富选题类型，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迈上新台阶。

“在城市文学日益崛起的大背景下，对农村有了解并且有兴趣的年轻作家越来越少。如何发现他们，如何将他们送下去、待得住、写得出，这是文学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谈到，需要深入了解“三农”的知名作家持续创作，更需要一大批能够书写新时代的农村、承担新时代文学使命、创造文学新样貌的“新人”作家。作家、编辑、评论家和读者的共同参与，将会为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建构更加良性的文学生态。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雷表示，作为中国作协所属学术期刊，未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选题策划中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乡土文学叙事传统以及柳青、周立波等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同时针对“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中优秀农村题材作品加强组织评论研究，积极引导推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结合新时代农村新变化，从更广阔的学术视角探讨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相关问题。

「把农村问题想透，把农村故事讲好」